

中国印刷
史料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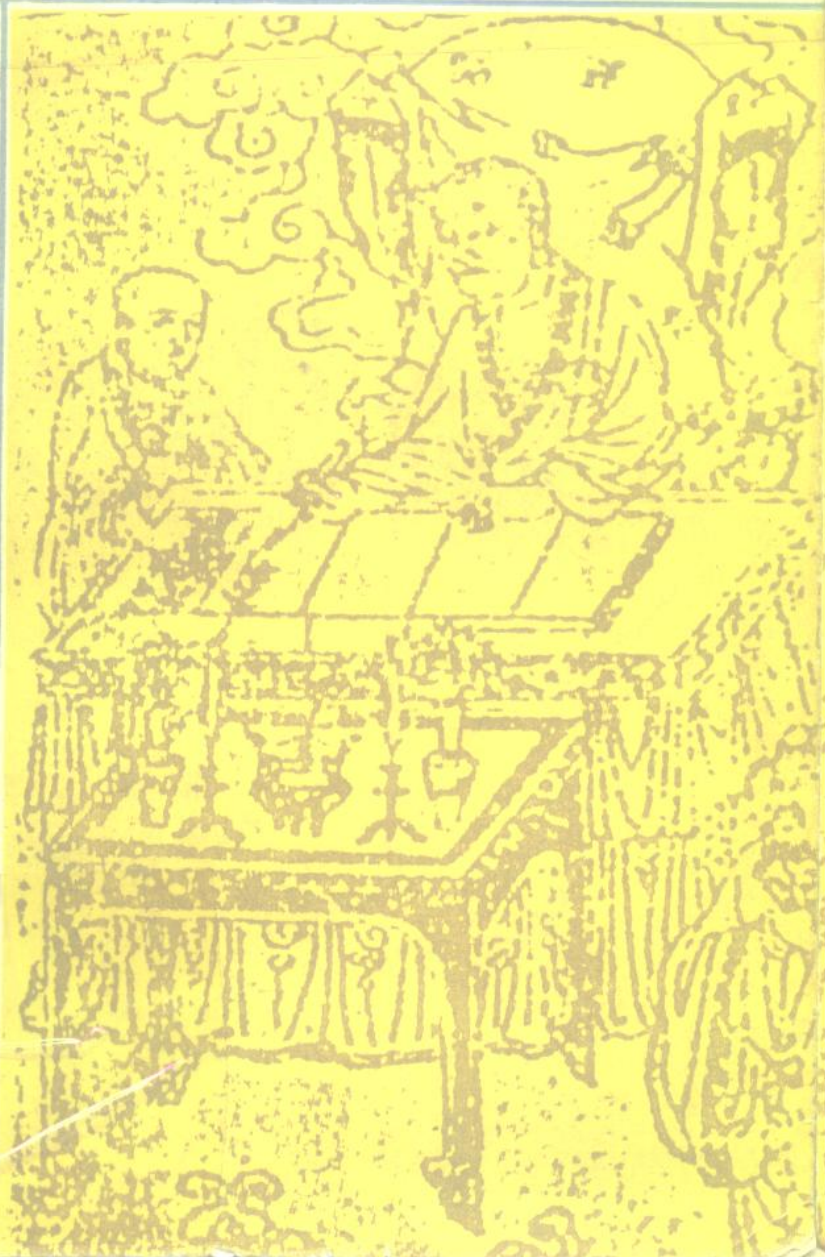
历代刻书概况

ZHONGGUO YINSHUA SHILIAO XUANJI ZHONGGUO YINSHUA SHILIAO XUANJI

LI DAI

KE SHU

GAI KUANG



历代刻书概况

《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之三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印刷印钞分会编

印刷工业出版社

(京)新登字009号

内容提要

《历代刻书概况》是本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之三，辑录了印刷术发明以来，唐、五代、宋(包括辽、金、西夏)、元、明、清、民国各代刻书的考略性文章47篇，系统汇集并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我国历史上不同朝代、不同地区，以及像建阳余氏、宁波天一阁、临边陈氏书籍铺、清朝武英殿等著名官私坊刻的刻书状况。集历代刻书史料之大全。为书史、印刷史、出版史和图书馆工作人员，以及文史工作者、大专院校文史专业师生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刻书史料。

历代刻书概况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

*

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翠微路2号)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1/32印张：18字数：466千字

1991年9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定价：15.00元

ISBN 7-80000-059-1/G·6

出版说明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由于印刷术发明年代久远，加之我国古代轻视科学技术，致使文献记载贫乏。国内外热心于印刷历史研究者只能依据文献上的只言片语进行分析、考证和判断，对印刷术发明年代等历史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而这些争鸣中之各家言，又因刊物发行面之局限和时间上的差异，很难为读者所共览。本书的出版，旨在将印刷历史研究上之各家言汇集于一书，提供给读者，以帮助读者了解各家观点及其依据，从而得出更加切实的判断，将印刷历史的研究推进一步。同时也为后世留下较为完整的印刷史料。

为便于读者查阅，本书按文章内容分四册出版：一为雕版印刷源流；二为活字印刷源流；三为历代刻书概况；四为装订源流和补遗。

本书所收稿件，均非原作，几经排印、抄录，错字甚多，而又难以查证，虽经精心审改，然疑惑之词不敢贸然更动，只好遵从来稿。对原作插图，因图稿质量和照顾全书体例等原因，部分插图有所割爱，并统一安排图序，至希鉴谅。

本书的选辑者是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该会在洪荣华同志领导下，在收集革命印刷史料的同时，着意于中国印刷史料的征集和整理。印刷工业出版社在此基础上略有调整和增删。

在搜集本书资料过程中，得到全国各地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编选工作中，又得到王益、史育才、方厚枢、张秀民、郑如斯等同志的鼓励、指导和帮助，王益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挥笔作序，在此一

并致谢。

印刷工业出版社编辑部

1989年12月25日

目 录

总 序.....	(1)
唐代刊书考.....	(6)
唐代刻书考略.....	(22)
五代监本考.....	(35)
五代吴越国的印刷.....	(41)
宋代刻书述略.....	(46)
建阳余氏刻书考略.....	(90)
访宋元明刻书中心地之一——建阳.....	(147)
建阳书坊刊刻的话本、历史通俗演义和公案小说	(151)
朱熹与建阳刻书.....	(156)
南宋的雕版印刷.....	(159)
南宋临安陈氏书籍铺考略.....	(183)
辽、金、西夏刻书简史.....	(188)
金代刻书中心平水考辨.....	(200)
金元时期平水印刷业初探.....	(205)
西夏刻书和西夏刻工.....	(222)
元代刻书述略.....	(224)
元私本考.....	(245)
《明代版刻综录》序.....	(260)
明代北京的刻书.....	(262)
明代南京的印书.....	(272)

试论明代版刻的成就·····	(283)
明代的彩色印刷——插图·评点·画谱·图籍的衍变·····	(288)
明代吴兴闵凌二氏的套版印刷·····	(301)
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	(309)
明清时期安徽的雕版印刷工艺·····	(318)
天一阁刻书考略·····	(326)
《天一阁刻书考略》补正·····	(335)
天一阁刻书续考·····	(340)
山西刻书年表(宋至明)·····	(347)
徽州雕版印刷术的发展·····	(363)
清代武英殿刻书初探·····	(376)
从清武英殿版谈到扬州诗局的刻书·····	(395)
清代上海版刻丛书叙略·····	(402)
“太平天国印书”史略·····	(412)
民国时期的雕版印书·····	(420)
中国古代的民间刻书业·····	(424)
坊刻本史略·····	(432)
麻沙本·····	(437)
闽本考·····	(441)
略谈福建的刻书·····	(479)
山西古代刻书考略·····	(489)
广东板刻纪事·····	(509)
云南最早的写本书和刻本书·····	(514)
吉林省刻书初探·····	(516)
陕西雕版源流考·····	(520)
浙江刻书文献·····	(529)
历代刻工工价初探·····	(553)

总 序

——重视印刷史的研究和学习

王 益

不久前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印刷术故乡里的‘陌生人’”，抱怨在发明印刷术的故乡，竟然找不到一本讲印刷史的书，跑了几家印刷厂和图书馆均无所获。关于印刷史的研究，在我国是很不发达，但情况比作者描述的要好一些。他不到书店去找，可见他对书店不抱希望。完全正确，在书店中是不会找到他需要的书的。这是我国出版发行工作落后的特征——出版的书不少，能买到的不多。至于图书馆中也找不到，我怀疑作者没有认真找，因为至少在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等大图书馆中是可以找到一两本印刷史方面的书的。我藏书并不多，但在我的书架上，有关的书有好几本。

印刷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和印刷史的学习，也是做得很不够的。讲解印刷史的通俗读物，出版很少；电影、幻灯片，都没有见到过，更不用说印刷博物馆了。印刷史的学习，也不被重视。印刷厂的同志，从厂长到工人，可能都不读这方面的书，所以在印刷厂中找不到。如果有人读过，那么他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印刷工作者了。我曾建议印刷工作者看一点印刷史方面的书，但反映并不热烈。印刷工作者也往往不研究印刷史。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没有人研究印刷史，印刷院校也不开印刷史的课，没有专门研究和讲授印刷史的教员。研究中国古代印刷史的人大多是研究古籍版本和目录的专家。关心我国近代现代印刷史的人多一些，但也缺乏有

计划的系统的研究。研究欧美日本等国印刷史的人更少。介绍西方印刷史的专著，好象没有出版过。《北京晚报》那篇文章的作者不禁慨叹道：“自建国以来，印刷史的研究始终处于‘业余爱好’的层次”。这句话，概括得非常好。

至于我本人，严格地说，还算不上一个印刷工作者。我是一个热心印刷事业的出版工作者。对于印刷史，当然没有研究。我只是读过几本论述我国印刷史的书，读过一些论文和资料。读了之后，感到很有益处。

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吴泽炎译，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和张秀民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 1958 年初版，1978 年再版），其著作过程，令我深受感动。

卡特是美国人，大学毕业后，到中国观光，学了点汉文，决心致力于中国印刷术的研究。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写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论述印刷术发明的背景、演变及其传播的权威著作。一个外国人，写成这么一部书，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阅读了无数的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各种文字的论文、专著、资料。他向各国的专家学者请教，在书上提到名字的就有 30 多人。他的书出版后的第二年，他就因病去世了，存年不过 43 岁。这部书成为他一生的唯一贡献。

张秀民，1931 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做古籍编目工作。他读了卡特的书的部分译文后（当时没有全译本），认为该书很有价值，但还有不足之处。而且印刷术是古代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印刷史却由外国人代庖，感到不是滋味，立志要写出一部更好的《中国印刷史》来。因此，他在编目的同时，注意收集有关版本印刷的资料，写成大小笔记约 70 本。他放弃了午睡和星期天的休息时间，把馆中所藏全部宋版书约 350 种翻阅了一遍；对所有明嘉靖重抄《永乐大典》残本 200 多册，数千种地方志、诗文集、笔记杂说及日文、西文版本目录书，也都涉猎了一番。这样勤奋，这样严谨，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才在 1952 年

着手撰写《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日本京都出版了日文版。这是一部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可以补卡特不足的权威的学术著作。

卡特和张秀民的书,给了我很多知识。不仅雕版印刷术是中国人所发明,而且活字印刷术也是中国人所发明。中国已经利用造纸术和印刷术大量印书的时候,欧洲各国仅能用笔在羊皮上抄写《圣经》。从明朝开始,中国的科学技术才逐步落后于欧洲。读了这些书,可以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使命感,激发发起愤图强的雄心壮志。这些书是很好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印刷是一种应用技术,又是一种工业。印刷工作者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技术工作者,一部分是经营管理者。我觉得两部分人都需要读一点印刷技术和印刷工业的发展史。现代的印刷技术,突飞猛进,难道还要向已被淘汰的古旧落后的技术去学习吗?现代的印刷工业是大生产,需要的是用现代科学武装起来的先进的经营管理,难道还要向落后的手工业作坊去学习吗?但是,我们知道:应用技术,属自然科学;经营管理,属社会科学。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它们的进步和发展,都有一定的继承性。新的发明和创造,都不是突然自天而降,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都经过一个逐步积累和吸收的过程。后一代人的科学研究,必须以前一代人已经达到的终点为起点,不能把现代科学同过去的研究成果截然割裂开来。学习现代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回顾一下前人走过的道路,不是没有益处的。最通俗的话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然,历史的借鉴和启发作用,有时不是那么直接、明显和立竿见影的,但它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我们决不能忽视它,小看它。

可喜的是,印刷史的研究,正在不断前进中。据张秀民介绍,留美学者钱存训博士所著英文版《纸与印刷》已作为英国李约瑟博士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的一部分出版。该书系钱博士

苦心钻研十年的成果。它列举了许多西方文献，证明西方人所谓“印刷之父”谷腾堡的印刷是受中国的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中文版已译出，正在校勘中。

张秀民继《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之后，在物质生活非常菲薄的条件下，不顾年老体弱，又完成了多达 54 万言的更完备、更系统的力作《中国印刷史》，把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该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已决定出版，正在排印中。我衷心祝愿它早日与读者见面。

由于党中央重视党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以及各地注意地方志的编撰工作，近几年来，对于印刷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有很大的进展。印刷专业杂志经常有印刷史方面的文章发表，印刷工业出版社也重视印刷史书籍的出版。这些都是令人高兴的事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一批以洪荣华为首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四军和华东解放区从事印刷工作的同志，以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组的名义，在收集和编辑出版革命印刷史资料的同时，也收集了三十年代前后散见在报刊上的有关一般印刷史资料文章，编辑成内部参考资料出版。印刷工业出版社认为这些资料有广泛的阅读和研究参考价值，正在进行整理，准备正式出版发行。从 1981 年起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和印刷工业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中国印刷年鉴》，1984 年文化部批准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成立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目前有许多同志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印刷史研究会，这些都有利于印刷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值得欢迎。

虽然如此，我们仍应看到印刷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任重道远，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成立到现在，已四年有余，没有一点踪影，实在遗憾。有关我国古代发明印刷术的实物资料，建国以来，也很少有新的发现；现存的实物资料有哪些，存放在何处，也缺乏调查研究。总之，工作做得很不够。主要问题在于，对印刷史研究和学习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印刷界

和有关各方面的普遍重视,需要做更多的扎实的工作,进行宣传 and 解释,予以推动,使印刷术故乡里的“陌生人”越来越少。

1989 年 4 月 12 日

唐代刊书考

向 达

一、引言

二、论隋以前及隋代即有刊本之不可信

三、唐代刊书之先导

四、中国刊书史上之咸通时代

五、述现存之咸通本《金刚经》

六、论现存其他各唐书本

一、引言

唐人刊书，散见载籍，哀为一帙，以资览观者，尚未之见。兹篇之作，即本斯意于诸纪载唐代刊书之文，就耳目所及者，为之排比，加以考辨，籍著其概。复次，有清末季，西洋考古学探检，西陲神州，古物席卷而西，其中不乏唐代刊本，用述梗概，以谕国人。而近代诸家著述，时有纪述。其他现存唐本者，并为汇录，验其然否。至于隋以前，及隋代之无刊本，与夫印度，像印之开，印书之先路，俱依次述之于首，以识唐代刊书之渊源云。

二、论隋以前及隋代即有刊本之不可信

宋人笔记，俱谓刊书，始于李唐。明陆深著《河汾燕闲录》方创昉。自隋代之，论清代承其说者，颇不乏人（如阮吾人《茶余客话》、高士奇《天禄识余》）。清末日本人，岛田翰著《古文旧书考》论述中国雕版渊源，犹袭陆说，更昌言南北朝，即有墨版。而一八九四年法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著《中国古代文明西源

论》(West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竟谓东晋咸帝咸和时, 蜀中成都即有雕版印书之举。拉氏所据, 为《蜀志》及《后周书》, 说者常訾, 其以模拓碑版, 误为印书。曾为覆检二书, 未得其据, 因具论(又按日本中村久四郎, 于《东洋史讲座》第十二号, 其所著《宋代学术宗教制度》, 文内谓敦煌发见之古物中, 有隋代木活字版, 发愿文云云。然同书十三号, 中村不折即函, 辨其为赝鼎伯斯诸人, 亦未之言, 则不足信矣。)今录陆氏及岛田二家之说, 于后继辨其诬。

(甲)陆深《河汾燕闲录》卷上(明嘉靖陆氏家刊陆文裕公《俨山外集》本)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 此印之始, 又在冯瀛王先矣。

(乙)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雕板渊源考》。

明陆深《河汾燕闲录》云: “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 是语见于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曰: 《废像遗经悉令雕撰》”, 市村器堂氏依此文乃云, 雕属废像, 撰属遗经, 即非刻书之谓。余则以为陆氏在明, 犹逮见旧本而记云雕板, 恐宋藏中, 必有作雕板者矣。又案此语, 不载于隋书及诸杂史, 信斯语也, 则隋时已有雕板也。

又予以为墨版, 盖昉于六朝, 何以知之。《颜氏家训》曰: “江南书本, 穴皆误作六”。夫书本之, 为言乃对墨版而言之也。颜之推北齐人, 则北齐时, 既知雕版矣。玉烛宝典引字训解淪字曰“其字或草下, 或水旁, 或火旁, 皆依书本”。已曰, 皆依书本, 亦可以证其对墨版也。是隋以前有墨板之证。

按陆氏所引, 隋文帝敕见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盖“周武之时, 悉灭佛法, 凡诸形像, 悉遣除之。号令一行, 多皆毁坏”。以至“塔宇毁废, 经像沦亡, 无隔华夷, 扫地悉尽”。故发此敕, 以“重显尊容, 再崇神化, 颓基毁迹, 更事庄严, 废像遗经, 悉令雕撰”。陆氏乃据此文, 以为印书之始。袁恬《书隐丛说》即谓“雕者属像, 撰者

乃经也，非雕刻之始也”。岛田氏不察，仍袭陆氏之误。故俞樾驳之曰：“至隋开皇敕，谓隋时已有雕板，则恐不然。悉令雕版，‘雕版’二字，自是撰定之误，雕像撰经，乃是两事。若云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废像岂可雕版乎。”（俞说见岛田氏著《访余录》之春，《在堂笔谈》其后，叶德辉著《书林清话》，论书有刻版之始，即取俞说也。）俞氏此言，可谓甚当。《历代三宝记》卷十二，有众经法式十卷。开皇十五年敕有司撰，袁氏所谓“撰者乃经也”者，此其证也。

又案陆氏文中，“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二语，后来引者各异其辞。孙留庵《中国雕板术源流考》，作悉令雕造。岛田氏不据别本，径作悉令雕板，并曲为之。解曰：“余则以为陆氏在明，犹逮见旧本，而记云雕板，恐宋藏中，必有作雕板者矣”。陆氏确曾见旧本，其所著《玉堂漫笔》卷下云：“世言大藏经五千四十八卷，此自唐开元间，总结经律论之目。至贞元间，又增新经二百余卷。宋至道以后，惟净所译新经又九千五百余卷。予见南宋藏经，与元藏不同，而本朝藏经，又添入元僧。以后诸人文字，而卷数仍旧室亦有添减欤”云云是也。然其家刊本《河汾燕闲录》作，悉令雕撰，并不作雕版。日本《小字藏经》，以丽元诸本校勘于此，亦作雕撰。无作雕板者。则岛田氏之说，不足辨矣。

岛田氏又据《颜氏家训》，江南书本之语，以为系对墨版而言，遂谓墨版昉于六朝。俞樾驳之曰：“又引《颜氏家训》，谓北齐已有雕版，更恐不然。如颜氏果以书本对刻本言，则当时刻本，当已遍天下矣，何至唐时犹不多见也。书本乃写本耳，古书本无不同，而传写各异，故云江南书本，对河北书本言，非对刻本言。书证篇，或云江南本，河北本，或云江南书（不言本），河北本（不言书）。随便言之，皆以江南与河北对。”（见《访余录在堂笔谈》）叶德辉亦非其说，以为“若以诸书称本，定为墨版之证。则《刘向别传》校仇者，一人持本后，汉章帝赐黄香《淮南子》、《孟子》各一本，亦得谓墨版始于两汉乎？岛田氏谓，在北齐以前，其所援据，止诸书称本之词，陆氏误字之语，则吾未敢附和也。”（《书林清话》卷一，书有刻版之始）

二氏驳论，确当不移。故在未有新史料发见以前，仅据陆氏与岛田氏之言，以为中国之有雕板，始于六朝及隋，盖不足信已。

三、唐代刊书之先导

中国在隋及隋以前之无雕版书，约如上述。而考诸现存实物及文献，唐代刊书之确然有据，则无可疑。现今世界上所存最古之印刷品，当推日本宝龟本《陀罗尼经》（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元年，即唐代宗大历五年，西历七七〇年也。关于宝龟本《陀罗尼经》，可参看朝仓龟三著《日本古刻书史》五至十三叶。又 T. F.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Chap. VII. 此章译文，见《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第一期）。然唐代日本文化，大都传自中土。如日本夹纈，其名见于宋王说《唐语林》，创于唐玄宗之时（殿本《唐语林》夹纈作夹结，今依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一，引《唐语林》文），即其一例，则刊印《陀罗尼经》，恐亦有所受也。顾文献无征，今不具论兹篇，所欲究者，为唐代刊书梗概。然于刊书之先导，亦不能不一述也。

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语其演化之概，当为由像印以进于禁咒，由禁咒进步，始成为经文之刊印，而其来源则受印度之影响为多也。今摭录诸家，言像印及印佛像之文如次：

（甲）《法苑珠林》卷三十九

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显庆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主名戒龙，为汉使王玄策等设大会，使人已下，各赠华氎十段，并食器，次伸呈使献物，龙珠等具录，大真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宝塔一，佛印四。至于十月一日，寺主及余众僧钱送使人。

（乙）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三十一《灌沐尊仪》

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为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消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

(丙)唐冯贽《云仙散录》印普贤像条引《僧园逸录》

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象，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

案《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九有云：“印度之法香末为泥作小窠，墙波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数渐盈积，建大窠波总聚于内，常修供养。”日本宝龟本之《陀罗尼经》，分置于百万小塔中，即所谓法舍利也。王玄策所获之佛印，即《寄归内法传》所云之泥制底（Kaitya）及柘模泥像一类之物也。始言印刷之文献，当以义净之言为最先矣（义净寄归传于武后天授三年五月寄回中土。天授三年，盖西元之六九二年也。宝龟本《陀罗尼经》在其后七十八年）。

此种佛印，流传甚广。日本大和法隆寺所藏不动明王像一纸，而印像三十；药师如来像一纸，而印像十二；阿弥陀如来像，以纵一尺一寸五分之纸，而印像百八尊。此外，尚有吉祥天女像、毗沙门天像皆一纸，而印像数十，当即佛印之类也。一九〇八年法人伯希和（P. Pelliot）探检敦煌石室，发见用佛印印成之千体佛，俱为唐代之遗（关于日本之摺佛及敦煌之千体佛，可参看日人秃氏祐祥著《古代版画集》及罗振玉著《莫高窟石室秘录》。罗文，见东方文库考古学另简）。考诸往昔，道家修炼登山涉水，往往佩带枣木大印，印上刻字数达四百（见《抱朴子·登涉篇》）。然初无传播之想，不过用以避邪而已，尚不得谓之印刷也。至唐代，印度佛印传入中国，摺佛之风，一时大盛。一纸中动辄印百千佛像，一印或数百千张，而后印刷术方告萌芽，遂有今日之盛。

《云仙散录》记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五驮俱尽，当办摺佛之流也。唯《云仙散录》一书，宋洪迈（说见《容斋随笔》卷一浅妄书条）、张邦基（说见《墨庄漫录》卷二）、赵与时（说见《宾退录》卷一）、陈振孙（说见《书录解题》）诸人，即疑其伪。清《四库提要》论《云仙杂记》称：“其自序称天复元年所作，而序中乃云天祐元年退归故里，书成于四年之秋，又数岁，然其书篇年复颠倒其为，后人依托，未及详考明矣。”右乃